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9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12年5月1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 “布衣参事”让决策更接地气
- ☆ 经常“洗脸”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
- ☆ 为什么造假之风屡禁不止
- ☆ “温和监督”中的理性力量
- ☆ 商与官的角色转换不该如此容易
- ☆ 深圳公务员聘任制5年来
- ☆ 我市青年网络社团有了自己的“家”
- ☆ 当前急躁浮躁暴躁成通病

欢迎登录镇江图书馆网站: <http://www.zjlib.net>



镇江名人（九十一）

革命烈士——邵建甫(1918—1944)，原名连保，又名振礼，大港镇人。幼年丧父，中途辍学，16岁到上海学徒，参加受共产党影响的厂外夜校学习。民国27年，离沪去太湖地区参加地方抗日武装，不久加入共产党。次年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工作。镇丹县成立后，任县委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局长。日军“清乡”前，被派隐蔽于丹阳西门小学，以校工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后又转至城内五洋商店管帐。民国32年，镇丹县县长包建华、副县长江辅华相继叛变，党组织遭严重破坏。邵奉命撤出县城，转移至西门黄庄、吴塘一带活动，化名胡强，任镇丹工委书记兼区长，坚持和领导镇丹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民国33年1月4日，县警卫连一举攻克叛徒包建华盘据的白兔据点。翌日前村日军调防，邵误以为日军撤走，即率区大队前往攻打，待冲近敌据点时，发现敌情有异，邵为掩护正面向敌进攻的同志突围，立即向敌据点开枪，并令大队其他同志撤离，在敌人机枪的猛烈火力下，不幸中弹，其他同志要背邵后撤，而邵考虑同志们安全，命令他们快撤，日军追上来后，邵英勇牺牲。事后烈士遗体，由党组织派人用棺木掩埋在都观庙(现丹阳司徒乡内)。解放后，移葬于大港镇西郊陆家湾。

革命烈士——徐盘荣(1915—1943)，原名古荣，武进县人。民国26年，日军侵占武进，盗贼蜂起，各村成立自卫团体，徐参加了大刀会。不久，大刀会被国民党改编为忠义救国军五支队一大队，徐任二中队教官。民国28年6月，“忠救军”派一大队潜赴浒墅关，拦截虹桥机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徐贯彻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意图，途中策动两个中队携械投奔“江抗”。民国29年调澄西县五区任联络员，6月任区大队长。翌年春，加入共产党，任澄、武、锡三县边区抗敌委员会武进五区区长。民国30年1月，调中共长江工委，随工委书记彭炎至和尚洲开辟工作，化名王大中，奉命做洲自卫团的工作，使其成为长江工委活动的掩护武装。民国31年10月，任镇丹县镇三区区长、区委书记，组织村民，率领区武装，烧毁白凌塘到元庄以南长达五华里的日伪竹篱笆封锁线；在日伪包围圈中，征收、转移抗日公粮；于上会阻击日军由宝堰开往镇江的汽车。民国32年8月，率部冒雨行军数十里，转移至三里村宿营，午夜被内奸用快慢机击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我市青年网络社团有了自己的“家”

由团市委和市志愿者协会筹建的“镇江青年网络社团之家”已经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网络社团之家？建成之后它将发挥哪些作用？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走访。

此前活跃于我市多个网络社团的网友“小爷们”告诉记者，以前各社团开展活动不是在网上发帖召集，就是到发起人家里开会，很不方便。而且有时各社团之间由于缺乏沟通，搞活动还容易“撞车”，听说网络社团之家要开放了，很高兴。他表示，以后各社团都可以在这里聚会，面对面交流，没准儿还能碰撞出更多创意呢。在聊到对这个“家”的期待时，“小爷们”说，大家都从网上走到现实中来，通过对话增进了解、互相帮助，再要组织活动，就可以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优点，把活动办得更出色。

在我市的网络上小有名气的镇江达人团团团长郝浩说，希望各社团今后能在这个“家”里常碰头，把全市的热心青年网友都组织起来，吸纳他们的智慧，把互联网公益活动作成规范化、常态化的事业，而不像以前只在三月才记起学雷锋，看到媒体报道哪家有残疾孩子、孤儿才知道去帮忙。郝浩认为，把这个网络社团之家建在志愿者协会，有利于联合志愿者的力量参与到互联网公益活动中去，把网络社团和志愿者这两大力量汇聚起来，就能帮助到更多有困难的人们。

团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张崇文是建立网络社团之家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谈起这个“家”，他告诉记者，在互联网时代，青年是网民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组织了不少公益活动，但受限于没有活动场所，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便。这时，为青年服务的团组织就应该站出来。在网络社团之家里，张崇文向记者展示了为各社团准备的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开辟这块地方，就是要给青年网友们一个现实中的家，让他们从网名和网名之间的打字交流变成面对面、心对心的对话。

——摘自《名城镇江网》



“布衣参事”让决策更接地气

在人们印象中，政府参事多是专家学者等社会名流。日前，武汉市宣布，将从普通市民中选聘 3 位政府参事，不限身份、学历和职业，其意见和建议可以直通市长。这一举措在全国尚不多

见。

来自普通市民的“布衣参事”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在武汉市长眼里，此举有利于集思广益、提高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决策水平。当地政府参事室更是期望，“布衣参事”能以超脱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和“直通车”的优势，上接天线，下接地气。

“布衣参事”是个新事物，但试图破解的还是老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创造条件让公众有序参与？如何准确对接民情民意，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直通市长”的“布衣参事”，与在人民大会堂里参政议政的两会代表、委员一样，发出的都是群众的声音，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布衣参事”的一个特点就是草根化，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甚至与弱势群体生活在一起，能够零距离了解民情民意。他们是民生的“温度计”，也是群众身边的“意见箱”。百姓生活到底有哪些现实困难，市政工程如何规划才能皆大欢喜，城市管理还存在哪些短板，通过“布衣参事”等民间触角摸清这些问题，相关决策才会更有准头，减少失误和偏差。

当今社会越来越专业化，决策者的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不管是调查研究、专家咨询，还是通过听证会、媒体发布等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以公开透明赢得决策的科学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而在众多的信息渠道中，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智囊团，民情民意才是最重要的决策参考。政府决策固然需要勇气与魄力，但最基本的还是先接好地气。

由人们对政府延揽“布衣参事”改进决策的期待，不禁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一些地方，市民质疑“退坪种树”，港口改名被迫叫停，如果从决策方面反思，恐怕也在于事先没有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公众意见，造成决策不仅脱离现实，而且缺乏社会基础，最终在执行实施上打了折扣。

武汉这次选聘的“布衣参事”只有3名，相对于已有的30多名“名流型”参事，人数固然有限，但传递的积极信号令人欣喜：政府决策越来越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越来越自觉地接地气。决策之道千万条，以人为本第一要。只有多接地气，工作才有底气，决策才有人气。

当然，如何让“布衣参事”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摘自《人民网》

经常“洗脸”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说明，要做好工作、推动事业发展，就要不断解决各种问题，而“洗脸”正是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仍然需要发挥“洗脸”的功能和作用。

“洗脸”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象说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倡导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所淡化，有的同志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不愿甚至排斥“洗脸”。其实，“脸是应该经常洗的”，经常“洗脸”才能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那么，党员干部应当如何通过“洗脸”保持党的纯洁性呢？

敢洗。党员干部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身上难免有缺点，工作难免有失误。有缺点和失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可怕的是不敢承认缺点和失误，不能及时纠正。现在，有的同志发现自身的缺点和失误后，惧怕缺点和失误暴露影响前途，不是积极地欢迎批评、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努力地加以改正，而是讳疾忌医、心存侥幸、遮遮掩掩，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有的党组织发现党员干部犯错误后，怕影响单位形象、影响领导政绩，因而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反而误了工作、害了同志。因此，无论党员干部还是党组织，都应敢于“洗脸”，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缺点和失误得到及时纠正。

真洗。“洗脸”的方式很多，如召开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思想交流、自我反省等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方式在一些地方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动真格的，不是真洗。比如，虽然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只是点到为止，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或者避重就轻，只说细枝末节，不讲根本问题；或者停留于表面，仅仅指出了问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深处找原因；等等。这种走过场式的“洗脸”，自然不能把“脸”上的“灰尘”真正“洗”掉。因此，“脸”不但要经常“洗”，还要真“洗”，“洗”出质量、“洗”出效果。

勤洗。生活中的洗脸是每天都要进行的，组织内、单位中也应当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政党要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就要始终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肩负的任务繁重艰巨、

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面对着“四个考验”、“四个危险”，保持党的纯洁性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因此，全党同志应当进一步增强“洗脸”意识，做到既敢洗、真洗又勤洗、常洗，从而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更好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摘自《人民日报》

为什么造假之风屡禁不止

“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鲁迅先生曾辛辣地批判“瞒和骗”。我们党历来倡导讲真话、办实事，可是，为什么造假之风依然屡禁不止？

造假的人，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动造假。这种人不以造假为耻，反以造假为荣，他们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通过说假话、办假事攫取名利。二是跟风造假。有的人认为“造富不如造假，实干不如浮夸”，认为“别人浮夸我也夸，不吹不夸是傻瓜”，于是加入造假的队伍。三是被动造假。有的干部因为上级逼得急，硬着头皮也上不去，于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说假话、办假事，根本原因是有利可图。让造假者得不偿失，才能遏制造假冲动。反之，如果说假话、办假事的人不但未吃苦头，反而尝到甜头，就会“劣币驱逐良币”，让更多的人陷入不敢说真话的困境。

破解“真话困境”，要让讲真话者“免于恐惧”。“免于恐惧”，离不开领导的正真正派。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乐于听真话，带头讲真话，努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良好氛围。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对说真话者“穿小鞋”、“扣帽子”、“打棍子”。

破解“真话困境”，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鼓励各种意见充分讨论，为党员干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条件。

破解“真话困境”，需要建立科学、准确评价政绩的考核体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浮夸盛行的年代，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简单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唯一依据，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回望往事，中国有“大跃进”、“放卫星”的不明智之举，有“周老虎”、“躲猫猫”的沉重教

训，但更有不少人勇敢地说出真相、坚持真理：“横刀立马”、敢怒敢言的彭大将军，不怕批判、敢说真话的马寅初，晚年痛写《真话集》、深刻剖析自我的巴金，顶着重重压力、揭开非典真相的钟南山……他们的坦诚和勇气，彰显了实事求是的人格魅力，标注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摘自《报刊文摘》

“温和监督”中的理性力量

今年山东青岛市政府启动了耗资 40 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座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 180 万棵树。质疑种树工程的市民，有人谩骂有人撒气，抱怨面子工程劳民伤财，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然而青岛“80 后”姑娘潘琦，却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致电政府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用合法的手段温和地质疑着政府决策。

“80 后”姑娘潘琦的监督表面温和，实则透着一股强大的理性力量，韧劲十足，让人眼前一亮，不由得让人竖起大拇指。

选择“温和监督”比选择情绪化监督要更有难度。当政府工作中的一些负面诱因出现时，抱怨撒气甚至谩骂往往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人们要释放这种情绪很容易，但要控制住这种情绪反应进而改用一种理性平和的方式质疑监督则需要勇气和智慧，需要成熟大气的公民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温和监督”也更务实，更有价值。其实，很多人对于政府的指责谩骂偏激空洞，有些人只是随波逐流，有些人则是不分青红皂白，这种监督方式虽然也能够形成一定效力，但缺乏建设性。

“温和监督”则以事实为依据，遵循程序，更容易找准问题的关键，更有针对性和合理性，更有说服力。笔者以为，不管“温和监督”在当前收获了怎样的效果，“温和监督”都是法治社会监督方式发展的潮流。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像潘琦这样的“温和监督者”，但需要强调的是，“温和监督”形式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政府对待“温和监督”的态度。如果政府只忌惮“会哭的孩子”，只重视擅长怨、骂、闹、访的监督者，不能给予“温和监督”应有的尊重，总是让理性的监督者失望，那么，“温和监督”将举步维艰，很难成为普遍现象。只有政府改善作风，增强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对“温和监督”每督必应，让“温和监督”每督必果，“温和监督”才能不断受到鼓励，

才能良性健康发展，才能成为正常自然的现象。

——摘自《中国妇女报》

商与官的角色转换不该如此容易

这几日，一位女性副县长的经历引起了舆论关注——王某，1990年进入山西文水县民政局工作；1992年到北京经商，与丈夫一起成立山西雪恩集团；经商15年后，于2007年底又进入文水县政界；2010年4月，升任县政协副主席；2011年6月，改任副县长——《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证实，其在文水县民政局15年间“从来不上班”，却一直领着工资。4月21日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办发布消息称，吕梁市委对此事高度重视，已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一半是商人、一半是官员，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官员，“当官”不误“经商”工，一个人究竟有怎样的能量才能在这两种角色之间行走得如此游刃有余？人们期待着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

近年来，各地频频爆出吃空饷事件，一些官员子女还没毕业就开始领工资，一些已经离职甚至被判了刑的官员工资照领，一些官员亲属甚至以吃空饷为荣，主动拿出来“晒”。官与商、权与钱之间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经商挣了钱，再用钱铺路，获取官职；做官再下海，用官场积累的人脉获取更多商机，成为企业家；个别地方，政府为保护纳税大户、招商引资，给商家开了很多绿灯，“交通违章只纠错不罚款”之类已然没了底线。

吃空饷也好，亦官亦商也罢，都是表象，而这表象背后，指向的其实是公务员选拔任用、进入退出及管理的制度和制度执行上的乱象。首先，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是不可以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其次，对公务员是有专门的考核制度和规定的，公务员的出勤情况如何、工作效率如何、履职情况如何，都是需要考核的范围，同时“公务员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将被辞退”亦是《公务员法》的明确规定，一个连续15年不怎么上班的公务员每年是如何通过考核的？再有，公务员的薪酬发放是怎么管理的，薪酬发了出去，有关部门难道从不检查领了薪酬的人是否在岗、是否在干事儿吗？

不该录用的人被录用了、不该领工资的人领了、不够资格提拔的人被提拔了，这样的乱象时有发生。就在这几天，湖南湘潭刚刚确认当地拟提拔任用“90后女副局长”确实存在违规情况，其学历和任职年限均不符合提拔要求。有时，真的不能怪百姓“草木皆兵”，见到提拔年轻人就犯

嘀咕，觉得“有背景”云云，而是那些被盯上的提拔确实没有几个禁得住刨根问底。

其实，相关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提拔任用机制都在那里，只是一些人太不经心、太不负责了。一些明显违规的事，官员们也并非不知道，而是往往抱着一种“别人都不管，我何必这么认真”、“管多了得罪人”的心态，得过且过。长此以往，在各种人情关系、身家背景、金钱利益的裹挟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随波逐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会并不断适应着各种官场潜规则，而那些人事管理方面的制度也不复严肃和公平了。

“吃 15 年空饷女商人变身副县长”可谓一只非典型“麻雀”，其中纠结的种种典型问题都该好好解剖解剖。

——摘自《工人日报》

“花钱买政绩”的口子不能开

近日，广州市大亚湾区政府印发一份内部文件，大致内容是，为了鼓励媒体记者、全区通讯员对大亚湾区建设成绩成就的正面报道，设立奖金重奖媒体记者和通讯员。其中中央级媒体每篇报道最高奖 10000 元，而市级媒体最低可得 100 元。该举措是大亚湾区政府在全市范围内首创。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不难想象，一个宣传报道大亚湾区建设成绩成就的舆论高潮或是可以预期的现实，“歌德体”报道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这一政策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吗？宣传地方建设的成绩成就，本就是媒体的职责之一，根本无需政府的奖励。这种额外的奖励，实属一种“谬赏”，说轻点是不当行为，说重点其实就是滥用公共财政。纳税人能答应吗？

另外，我们该怎样定义“正面报道”，又由谁来定义？事实上，正面报道并不意味着歌功颂德，而批评和质疑政府，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也未必就是负面报道。很多时候，越是“不好看”的，具有批判性的报道，越是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报道才具有一种“正能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面报道。

最最让人担忧的，还在于政府重奖所谓的“正面报道”，有变相干预甚至操纵舆论的嫌疑。新闻工作者遵循新闻规律办事，应当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不受外界尤其是权力的影响。但重奖可能把新闻报道变成一种“有偿报道”，从而让媒体进一步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如此置媒体舆论监督的天职于何处？

政府重奖所谓的“正面报道”，其实是“花钱买政绩”，用纳税人的钱制造执政美誉。值得警惕的是，以往这种行为一般是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进行的，而现在则演变为一种无所顾忌的明规则，政府竟然专门发文，这可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摘自《河南商报》

“毒胶囊”之痛 监管为何总缺失

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犹如连续剧一般接连上演，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从齐齐哈尔假药到山西问题疫苗……其不断翻新的花样与匪夷所思的手段总是挑战着人们想象力的极限。近来的主角是以旧皮鞋为代表的废旧皮革制品——它们竟成为制作明胶的原料，被多地厂商制成药品胶囊，流入市场。

关于食品与药品安全问题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它连结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关乎产业健康发展、国家安全以及民族未来的大事。然而在这样重大的事件面前，监管却总是缺位或迟到。

在媒体爆出“毒胶囊”事件4天之后，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责令吊销3家胶囊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同时公布第一批抽检结果，修正等9家药品企业使用的胶囊铬含量超标；并责成相关省药监局对违法违规企业予以严肃处理。修正药业就“毒胶囊”事件公开道歉，浙江省新昌县药监局局长停职接受调查。但人们担心的是，事件的发展历程会遵循一个似曾相识的轨迹行进：舆论谴责生产者丧尽天良和监管者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漠视，有关机构严厉查处责任人，下架相关产品，渐渐风平浪静……

但愿，这次事件能够有所不同。因为“毒胶囊”只是冰山一角，其发生的机理与土壤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当局应以此为契机，改革监管机制，强化行政问责，建立“从田间到餐桌”、“从原料到成品”的可追溯管理体制。

首先，监管需要权责明确，全方位无缝对接。此次“毒胶囊”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药品辅料监管相对药品来讲比较薄弱，官方对于成品药的监管，只检测胶囊内成分，不检测作为辅料的胶囊。这就给了一些厂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有更加明确、具体、细致的法律法规，克服管理“碎片化”与脱钩现象，不给违规操作留一点空间。

其次，要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毕竟，每每发生事故“亡”的并不是“羊”，而是“大过天”的人命，民众需要的不是用自身的健康乃至生命来换取一次“运动式”执法，而是需要官方加强

日常监管，防患于未然。

再次，要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惩处力度。在美国，药品企业哪怕出一点小瑕疵，都会招致重罚。2009 年，辉瑞公司在营销中故意夸大药品适用范围，就被政府重罚 23 亿美元。正所谓“重典治乱世”，面对高额的违规成本，企业必然投鼠忌器。

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凸显出政府改革的紧迫。不可否认，很多暴露出问题的企业并非“小作坊”，而是大企业、名企业，他们是当地政府的宠儿，甚至是“财神爷”，政府怎么可能实施严格的监管而得罪这些“财政大户”呢？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必须摒弃唯 GDP 论，斩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让政策运行与法律监管都在阳光下。

——摘自《香港文汇报》

不是每个被强拆家庭都有清华博士

2010 年年底，因老家房屋在未签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凌晨被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致信工学博士潍坊市长许立全。两年之后，王进文的法律维权之路终于看到一线曙光。今年 3 月，山东省认定他家所在区域征地合法决定的裁决被国务院撤销，王进文收到了盖着国务院大印的行政复议裁决书。

一年多前，清华法学博士王进文因老家被强拆致信市长，其公开信被网友盛赞“言辞犀利，不卑不亢，很多问题直指拆迁现状”，而他的维权故事也就此进入公众视线。一年后的今天，王进文和关心支持他的人们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国务院推翻了山东省政府认为征地合法的决定。显然，征地都是非法的，强拆王进文家房屋就更加违法了。

倘若是拍一部类似《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拨乱反正、民愿得偿的结局应该称得上大团圆；不过，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来说，清华博士扳倒省政府裁决却难言胜利。

王进文不是胜利者。尽管他的诉求惊动了国务院，但撤销征地决议已然是迟到的正义，纵然山东省政府依法重新裁定，强拆却是生米煮成熟饭。在王进文家的宅基地上，高楼矗立，机器轰鸣，“春天有六双燕子做窝，充满生机，养有两只狗，很可爱”的温情老屋只能存在这位博士的记忆中。而作为一项集体决策，恐怕不会有人为征地被违规认定合法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王进文维权只是取得名义上的成功，真正的强拆既得利益者依然可以狂欢。

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王进文学了 10 年的法律，也一直试图用法律途径解决所

面临的问题，但在写公开信前，他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仍无法改变房子被强拆的命运。唐福珍“绑架”了自己的身体，王进文“绑架”了清华和博士，他们的区别只是身份和形式的不同，闹大维权的本质是一样的。如今，关于征地合法的裁决是撤销了，但法律在王进文心中的信仰如何重塑，法律在整个社会的尊严如何修复？

撤销省政府裁决固然是理性纠偏，却更证实有关部门的行政过失。一起征地强拆事件，造成民意沸腾，省政府却坚持认定征地合法，其公信力何在？而王进文向十多个部门递交信息公开申请几乎都没有回音，提起的5起诉讼中4起石沉大海，足见一些部门对于公民个体的傲慢和偏见。

不是每个被强拆家庭都有清华博士，也不是每一份不合理裁决都能由国务院撤销，王进文维权记有太多偶然和幸运因素，很难被复制。如果每一次都要依靠吸引眼球增添维权砝码，总有当事人黔驴技穷、社会舆论视觉疲劳的一天。相信，对于王进文来说，倘若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政府的足够尊重，纠纷矛盾能够在法律体系内得以妥善解决，清华博士扳倒省政府裁决的“胜利”不要也罢。而这又何尝不是公众的期待呢？

——摘自《羊城晚报》

神州扫描

深圳公务员聘任制 5 年来

近日，江苏、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均表示，2012 年将试点聘任制公务员制度。这意味着该制度将在全国陆续铺开。

2007 年，深圳最早进行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历时 5 年。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肖志恒称，深圳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找不同

2007 年，大学毕业的李萍希望在深圳找一份稳定工作，她参加了深圳市聘任制公务员考试并被录取，开始上岗。

和其他同事一样，她每天的工作朝九晚六。到单位，先整理一些材料，再将上级部门下达的文件阅读、分类，然后分发到相关部门。

办公室同事王莹，是一名委任制公务员，两人的工作时间和内容基本一样，写材料，发文件。

两人唯一的区别是，李萍需要与单位签订三年的劳动合同，而王莹不需要。“理论上，是否能继续在单位工作，还得看三年后能否续签。”李萍说。

作为聘任制公务员，李萍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晋升。“我们的晋升渠道是从助理升主管再到主任，6年升一次。委任制公务员的职级评定理论上是3年一次，他们升得更快。”李萍报考的是技术类公务员，“不能成为管理人员，也就是说不能做领导。”

谢晓宏是2010届的聘任制公务员。她说，有些职位明确规定不任用聘任制公务员，这对有想法的年轻人是一种打击。

能进能出

如今，作为聘任制公务员的李萍，在养老方面，享受的是“社会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制——她和财政各拿出月工资总额的8%和10%缴纳社会养老保险。

政府给聘任制公务员购买养老保险，实行与企业接轨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公务员聘任制改革中另外一个亮点。

李萍说，“我的收入要比委任制公务员低1000多元。”为了淡化二者收入差异，深圳市财政补贴聘任制公务员个人缴纳部分。

同时，政府每月按聘任制公务员月工资总额的8%为其缴纳职业年金，年金与其奖惩挂钩。

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为公务员职业建立了一个能进能出的渠道，解决了公务员养老制内部的不公问题——比如，一名公务员工作40年，职级是科员；另一名从企业回流的公务员，职级是正处，哪怕他只为政府工作了1年，退休工资也会比服务了40年的公务员高。

至今，已在深圳司法系统工作10年的委任制公务员周丰，形容他的职业状态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说，刚毕业时，法律系的优等生去考公务员。10年之后，当初去企业或做生意的人，都成为管理者或发了财。“这种失落难以言说。”

“现在，我每个月收入一万元左右。”2000年时，国家曾鼓励公务员辞职，并奖励10多万元资金。周丰说，“我30多岁，出去重新开始，没这个胆子。出去后，我们没有养老保险，等于这些年的青春浪费了。”

周丰很羡慕聘任制公务员的养老制度，“他们像香港一样，退休后就能拿到一大笔职业年金。我们则要尽可能地活久点，才可能多拿点。”

考核走过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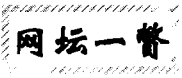
李萍现在年收入十多万元，工作压力并不大。她说，聘任制公务员考核内容、方式与委任制一样，要对勤、德、廉等方面进行考核。

考核时，一般是由自己写一份总结，然后由领导和同事打分，考核基本能过。她觉得，“这种考核主要还是看你与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来定。”

在聘任合同上，解除合同的条件，基本与委任制无异。一些公务员认为，考核内容比较虚，这种考核方式并不会太大压力。

有受访公务员认为，如果考核、淘汰机制不完备，强制退出机制就无从谈起。聘任制也谈不上打破了“铁饭碗”和带来“鲑鱼效应”，“顶多是形式上要签几次合同而已”。

——摘自《京华时报》



当前急躁浮躁暴躁成通病

“三躁”：急躁、浮躁、暴躁现在已成为不少人的通病。

一些人在求学、升职、挣钱方面倾向于“抄小道”，一些官员惦记着位子，热衷制造“短、平、快”政绩。眼下，在我们的身边经常看到这些现象：

不愿意排队——去超市买东西，左顾右盼总想找一个最短的队，有时候竟不惜丢面子加塞；看到别的队列行进得快一些，就后悔自己没有选好队。

等不了红灯——十字路口遇到红灯，不愿耐心等待，而是猛抢快行。开车时，总觉得前面的车太慢，一有机会就变道超车。

离不开手机——打电话、上网、发短信……手机没随身就心烦意乱；手机随身时，就时不时拿起来看是否有新信息或未接电话，生怕有什么遗漏，听见别人手机响也会下意识地看自己的手机。

受不起委屈——被别人批评一下，心里就会剧烈波动、不痛快，千方百计寻求报复反击，而对别人的任何一点过错都不能接受，缺少包容心。

沉不下身子——做工作，总想投机取巧走捷径，不愿意考虑该怎样循序渐进解决问题；做学术，不是踏踏实实搞研究，而是东拼西凑、搭花架子。

惦记着位子——一些官员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把城市建设作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乐此不疲，热衷于制造容易看得见的“短、平、快”政绩。有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没干几年，就惦记升迁、晋级，盯着待遇、位子四处张望，唯恐自己落后，群众戏称“三年不动，四处活动”。而一旦换了岗位，板凳还没坐热，又盯上了其他位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教授陆绯云认为，人生目标高，生活节奏快，是积极向上的一种表现，是好事。但随着节奏不断加快，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活压力也在加大，一些人攀比心理重，干事急于求成，过于追求财富和地位，久而久之，使“三躁”情绪在社会上凸现：

急躁——为尽快达到目的，往往不经过仔细考虑或准备就行动，缺少耐心，“等不得了”。

浮躁——面对变化中的社会，心中无底，不知所措，盲目恐慌，专注度不够。急功近利，这山望着那山高，为追速度、求效率，不愿意遵守规则，在求学、升职、挣钱等方面倾向于抄小道，以至不惜代价地投机。

暴躁——盲动冒险，缺乏理性。一不顺心就激动愤怒，争吵谩骂，大打出手，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陆绯云认为，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水平节节高，承受能力却越来越弱。股市涨了，有人会因踏空而悔不迭；股市跌了，又会因为没清仓而痛断肠。没买房子，房价涨了会生气；买了房子，房价跌了也会郁闷……本来相互容让、相互理解就可避免的小矛盾，偏偏要激化升级，暴戾之气在悄悄弥漫，情绪失控就很难避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三躁”已成为现在许多人的通病。人们总在担心，如果你本分做事，就一定会有人投机获利；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就很可能再没有新机会了。很多人无视规则，实际上其意识里也没有不可逾越的规则。

“看到身边的朋友买股票、炒地产发了财，自己哪里还有心思做实业？”浙江温州年轻的企业主田亮经营着一家小型制鞋企业，然而这几年，资本炒作更能让他提起兴趣。虽深知高回报必然带来高风险的道理，田亮却总是认为自己是只赚不赔的“幸运儿”。

从炒股、炒房再到炒农产品、炒收藏品，田亮一直乐此不疲，投入制鞋生产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资本炒作的资金越来越多；踏实干事的劲头没有了，快速赚钱的心思越来越强烈。

李成波 2002 年大学毕业，现为北京朝阳区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虽然事业小有成就，但仍然每天脚步匆匆：早晨忙着赶地铁，中午吃饭多是快餐，晚上还得急着处理白天未完成的工

作……他说，同事们都这样，“看着别人大步向前，自己哪能慢下来？”

“其实我也想慢慢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赶’的状态已经成为一个惯性。”李成波说，“情绪容易起急，成为困扰自己的一个大问题：出门遇上堵车就会觉得浑身难受恨不得骂人，也会为错过一班地铁而懊恼不已……”

李成波说，“我们提倡对客户真诚服务，却越来越难换来客户的满意。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工作没做好，而是因为客户的要求太高。”几年前，工作出点意外还能彼此包容一下，关系处得较融洽，可现在，稍有不周，就会遭到客户一顿责怪甚至谩骂，“理解少了，埋怨多了”。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hk@126.com